

30
三十年集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反思的年代

Thirty Years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出版社
萧功秦◎著

生命历程的睿智表达

自由灵魂的深情歌唱

萧功秦 · 反思的年代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陈家琪	陈嘉映	陈建华	陈思和	甘 阳	葛剑雄	葛兆光	何光沪	何怀宏	江晓原
雷 颐	李公明	李 辉	李庆西	林贤治	钱乘旦	钱满素	钱理群	秦 晖	孙 郁
萧功秦	许纪霖	徐友渔	余中先	查建英	郑也夫	止 庵	周振鹤	朱学勤	朱正琳

倾情奉献

反思的年代

萧功秦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的年代/萧功秦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410-9

I. 反… II. 萧…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297 号

反思的年代

萧功秦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3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10-9/C · 150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作为“文革”后考上大学与研究生的那一代人，我们的经历颇为特殊。我们曾经被“文革”乌托邦所吸引，曾经有过革命的狂热与浪漫的诗情梦幻，并亲眼见证了极左革命如何变为民族灾难。我们在工厂与农村插队的底层生活中，在对普通百姓的困苦命运的反思中，摆脱了旧教育体制加之于我们的左的政治观念与思维定式。我们开始在独立思考中觉醒，重新回归到常识理性。当青年时代还没有结束时，有幸地迎来了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于是，我们带着这种特殊的人生经验走上了学术道路。

在新的大变革时代，我们面对着种种前人没有解决的时代难题：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压抑我们的灵性，却又是我们人文精神支柱中不可分离的部分；经历了极左专制文化的困厄以后，自由对于我们是那么可爱，却需要理性的滋养与平衡，然而，生长于革命文化中的我们却从来没有熏陶过这种妥协宽容的理性文化；民主是饱尝极左专制之痛的人们心中最真诚的信仰，它的实现却又需要如此复杂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却又在我们生活中如此缺乏；威权政治与令人厌恶的专制是如此相似，然而一旦没有了它，社会又似乎难以自发建立秩序，然而，当我们不得认可威权政治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选择时，一种不受制衡的威权一旦变成巨无霸，却使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仿效西方多元民主，以免造成社会脱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受浪漫的革命文化心态的支配，再次陷入到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陷阱……如何理性地寻求通往中国真正复兴的道路？我们处在这些深刻的时代疑难问题中，我们这一代注定生活在这种反思与追寻之中。

本书收入作者不同时期的二十六篇代表性的文章，纪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一个具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价值取向的启蒙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新权威主义者与理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二十多年来，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学理心得，尝试对这些时代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我

的这部纪录三十年求思之路的论集,取名为《反思的年代》。

自 80 年代中期从元史的专业领域转向公共学术领域之后,我这二十多年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 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里,我是一个接受五四启蒙传统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收入本书的第一、二篇文章,表达了这一时期我对保守主义国粹派的历史反思。我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1986)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阶段,从 1987 年到 1994 年,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时期。我从严复思想与近代史研究中获得启示,并运用这种历史体悟来理解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权威政治选择的必要性。出版于 1995 年的《萧功秦集》,可以作为新权威主义理论的总结与思考。收入本书的 1988 年到 1994 年发表的文章,均代表这一阶段的成果。

第三阶段,从 1995 年到 2005 年左右,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转型政治学时期。更具体地说,我实际上是从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视角与范式,来研究当代中国转型政治中的中观层次的、更为具体的问题,如分利集团化,腐败与地方苏丹化,社会各阶层心态变化趋势,意识形态转型等等。这十年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战略与管理》这本刊物上首发,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正因为有幸出现了这样一个刊物,我的思想得到了表达场所。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收入我的《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2001)一书中,与此同时,我还运用政治学方法考察解读清末变法与新政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1999),并进而运用从这一历史学研究中获得的理论启示,来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自 2005 年以来,我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政治体制与模式的类型学特点与历史路径,考察为什么这种被我称之为“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我力求通过理论的研究与结构考察,探讨通往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收入《中国的大转型》(2008)一书的论文,均体现了我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如何走出维新模式的困境》,提出通过法团主义方式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以此来避免未来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民粹主义的后果,就是我对我的最新思考。

多年以来,有人把我归结为知识分子中的右翼,我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自

由主义终极价值关怀的学者,我既完全不同于京城中的某些缺乏人文关怀的冷漠的国家主义者,也不同于经常被作为批评对象的“浪漫主义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后者最大的不同的是,我更为务实,更理解历史加之于中国的负担与包袱。经由三十年的思考,在我看来,通过一种理性的、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威权政治来发展市场经济,并通过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多元化,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样的渐进的民主化路径最为现实可取。我相信,只有在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民粹主义泛滥,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民主的软着陆。当然,这一切的关键还在于一种促进民主发展的健康的社会合力的形成。

记得有次在给本科生上“20世纪中国政治史通论”最后一课结束时,一位学生站起来问我,你说你对生活始终是乐观的,你从来没有过空虚感,这是与你的个性有关,还是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是什么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我回答说,由于我是在极左时代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我们所经历的民族苦难,使我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责任感,我总在想,千万不要让我们这整整几代人经历过的带血泪的痛苦,变得没有警示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在极左时代获得的人生体悟与经历,又使我们拥有了进行这种反思的经验资源。我们是把苦难变为思考的对象与走向改革行动的那一代人,是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的那一代人。这样的生活是注定不会空虚的。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选择每年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这里我要告知各位读者的是,本书收入的早期文章,大多曾经收入过去已经出版的论文集中。本书之所以再次收录它们,是因为本书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精神历程与思想学术发展脉络完整地再现出来。另外,近年来完成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已经收入《中国的大转型》与《历史的眼睛》(2010)中,为了避免重复,本书中没有收录。为了体现自己学术思想发展的全貌,我会在各年的作者按语中提到它们。

本书的附录一“在精神自由中反思”,是我专为本书出版而撰写的治学与思想回忆录。此外,我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上一段数百字的作者按语,其中简要地回顾了我在当时的思想求索与思想转向的过程。把上述附录与这二十余篇按语合在一起,恰恰构成我的学术发展过程的比较完整的自我介绍。

2010年3月2日于上海寓所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八六

观念的屏障与近代士大夫的悲剧——《儒家文化的困境》结束语 / 1

一九八七

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 / 5

一九八八

文化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从激进回归保守的新思考 / 12

一九八九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与《文汇报》记者的谈话 / 17

论当代中国浪漫主义改革观——对激进“制度决定论”的批判 / 23

一九九〇

“严复悖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 37

一九九一

从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对中国早期民主思潮的历史考察 / 56

一九九二

历史拒绝浪漫：改革时代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与《中国时报周刊》

记者的谈话 / 68

一九九三

走向理性与成熟：对 80 年代中国改革的反省与展望——再答海外
读者 / 81

一九九四

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 / 94

一九九五

中国现代激进政治的思想起源——严复对“主义决定论”的批判 / 101

一九九六

戊戌变法与“极致性政治文化” / 116

一九九七

台湾版《历史拒绝浪漫》自序 / 123

一九九八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
展望 / 133

一九九九—二〇〇一

从入魅到出魅——世纪之交谈百年中国变革 / 147

二〇〇二

中国模式的政治学诠释——后全能主义体制的发展优势与矛盾 / 153

二〇〇三

从孙志刚事件看社会公正机制的重要性 / 165

二〇〇四

战争片中的人性 & 诗意——我的思想手记之一 / 169

二〇〇五

中国文化史随感录——我的思想手记之二 / 178

二〇〇六

中国可以在世界文明冲突中承担缓冲作用 / 203

二〇〇七

关于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通信——我的思想手记之三 / 208

二〇〇八

与学生讨论人生哲学——我的思想手记之四 / 216

二〇〇九

如何走出“维新模式”的困局——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第三种路径的
对话 / 226

二〇一〇

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 / 237

附录一 在精神自由中反思——回顾我的学术之路 / 265

附录二 萧功秦主要著述目录 / 277

一九八六

纪事

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前三年,我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天天骑着破自行车跑南京西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古籍室,研读一本又一本的线装本的元人文集,在冷僻的元代中期政治史领域自得其乐。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念头,学术转向上的突变发生了:作为古代史的青年讲师,1984年6月给大学生上最后一堂中国通史课的最后几分钟,在头脑中油然而产生了一个必须由自己回答的问题:这节课上讲到的清乾嘉时代的万马齐喑与士风消沉,如何影响了士绅知识分子应对二十年以后到来的西方挑战的方式?带着这个问题,从此我从古代史跨到了近代史领域。

此后我仍然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但已经不是读元人文集,而是读近代士大夫正统派的文集,一年后,我写出了十三万字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一书,此书1986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有人称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用社会发展史以外”的方法,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的“开风气之作”。我在该书“后记”中,写下了一段在夜深人静的古藤下抒发的激情的话语,曾被一位朋友说成是“无意中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宣言”。这本小册子使我作为一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在学术舞台上登台亮相。

观念的屏障与近代士大夫的悲剧

——《儒家文化的困境》结束语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转瞬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当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吸收这种异质的更先进的文化中的营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和建设性的转化。这就意味着，以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来作为对于挑战的回答。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文化作为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来加以排斥，以此实现纯洁的传统文化的自存与民族自卫的双重目标。

近代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显然表明他们做出的是第二种选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在正统士大夫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也即他们心目中的“圣学”，乃是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当人们认为古代圣贤已为后代确立了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而无需自己与“化外”的异邦人来补充、变更和发展的时候，那么“圣学”这完美的体系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结构。来自西方文化的信息冲击，只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完美体系之外的谬误和杂质去予以摈斥了。同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将被人们视为圣教与异教的冲突，天理与悖谬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完美与缺陷的冲突。“人之持异教愈坚，我之护圣教愈力”^①，一种主观上捍卫真理的神圣使命感，在客观上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顽固迂腐的卫道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正统派恰恰是保守派，而保守派又恰恰是正统派，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近代正统士大夫始终不自觉地处于传统文化心理之圣学投影的思维方法为经纬编织成的意识网络之中。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用这一认识工具来看待新兴的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就丧失了如实认知这一客体对象的可能性了。千百年来，当一代复一代的士大夫运用这一意识网络来认识和适应周围的环境时，他们从来就是得心应手，不曾遇到过任何困难。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意识网络不但不再是人们用来认识和应付骤然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挑战的工具，恰恰变成了阻碍人们认识这一现实挑战的障碍。正如本书已经分析过的，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士大夫阶层实现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更新与转化的过程是如此步履维艰，以至于人们为吸收异域先进文化所迈出的任何微小的一步，几乎都不是靠“圣教”本身给予他们的精神上的力量睿智，而是靠一种在外部强烈刺激下唤起的生存者的最本能的避害反应和危机心理。而且，这些通过千辛万苦而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朴素的新鲜认识和真知灼见，又不得不在与道统信条的剧烈搏斗和冲突中作自我挣扎，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地盘。

正因为如此,正统士大夫对“岛夷”们最初的态度是冷漠的、傲然而鄙夷的,接着他们由于受“西方怪物”欺凌而产生被压抑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而后来,这些屈辱感和挫折感是如此强烈地刺激他们的心灵,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幻觉中的“天神下凡”的奇迹来予以排遣并导致国粹主义最后一战的惨败。保守的顽固士大夫们这一独特的戏剧性的经历,在我们看来,无疑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可理解性。

我们还应当提及一下那些经历了庚子国难之后的国粹派的最后一批老卒们。在他们向隅而泣的怀旧感叹中,也许会留给我们一些最后的启示。1913年,一位在上海穷极潦倒的名叫胡思敬的士大夫,在为清议派著名人士屠仁守的奏折刻板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自国变作(指庚子事变)……而夷服夷言,东南各省尽成犬羊窟宅,国家既废,鹿洞、鹅湖,先圣讲学之地,亦鞠为茂草。乱后相逢,执手欷歔,亦有难言之隐。海上流寓诸公,赁屋而居,妻孥相对,悲咤不能自存。回念同光诸老,罢官之后,坐拥皋比,牛酒束脩,馈问不绝。……更如海上神仙,可望不可即。此予读先生(屠仁守)之文,更增迟暮感,而栗然叹于骨肉之亲不可离,祖法不可轻变也。^②

透过这如泣如诉的伤感和悲哀,我们可以感悟到:胡思敬的个人精神遭遇,恰恰是整个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近代历史命运的缩影。它还告诉我们:中国近代正统派士大夫的真正悲剧,恰恰在于他们希望通过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方式,来保持对“祖法”与“圣教”的绝对完美性的自我感觉。他们又何尝不希望得到后代的赞誉和尊重,他们对国粹主义的坚持又何尝不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良好”心愿。然而,他们的信念与现实的冷酷冲突,恰恰构成了1840年以来整整三代正统士大夫在圣教保卫战中连续不断的失败纪录。

悠久而伟大的中国文明史中这最沉重的几页终于翻过去了。曾经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所有的人们,都早已长眠地下。正统士大夫们连同他们的愤怒、悲哀、激情、眼泪和呐喊,早已消失在永恒的冥冥的黑暗之中。

对于已经作古的人们,后代人是不应做过多的指斥的。如果我们诞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中也很少有人能避免那种迂腐、荒谬与不可思议的保守。一种曾经焕发出夺目的异彩的、古老而又呈现出僵化的传统,毋庸置疑是比任何现实的

个人更强有力的东西。它抚育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给他们以知识与智慧,同时,也将反过来力图支配人们的命运。

尽管如此,就正统士大夫作为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阶层整体而言,有一点也许是后代人们难以原谅的:从1840年到1900年的整整六十年,那并不是一个无法获得新知识的时代。明明有着许多获得新知识的机会,人们却没有加以利用,这些机会甚至被人们当作邪恶而坚决地加以摒弃。

于是,在我们结束本书的时候,作者想起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那儿曾经生活着一个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堪称为文化上最落后的民族——塔思曼尼亚人。他们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石头搭成的障壁旁,他们从来没有萌发过建造草房可以避寒的念头。他们不知道陶器为何物。他们的打制石器,也绝不比三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更为高明。1877年,当最后一个塔思曼尼亚人死去时,这个文化停滞的民族也从此绝灭了^③。导致这个不幸的民族绝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其他民族创造的智慧成果,以便适应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他们从来不曾指望海平线上会出现另一个文化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信息。

如果说塔思曼尼亚人的文化停滞和最终灭亡,是因为他们面临着自身无法跨越的地理障碍,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的种种挫折、失误与由此造成的不幸的,绝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的传统观念筑成的屏障。这甚至是比浩茫无际的大海更严峻的屏障。因为它曾有效地使无数精英人物把拒绝采撷其他文化中盛开的芬芳的人类智慧之花,视为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过的,一个灰色的回忆,决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④。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这些僵化了的传统观念的屏障的真正的撤除本身已成为历史的时候,在炎黄子孙的土地上,那美丽的凤凰——那东方的不死之鸟,将会展翅飞翔。我们将追随着她,环绕着她,噙着欢乐的泪,唱着欢乐的歌。

① 叶德辉:《明教》,见《翼教丛编》。

② 胡思敬:《屠光禄疏稿序》。

③ 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14页。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2页。

一九八七

纪事

我没有想到《儒家文化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这本小册子会引起社会上如此大的轰动,一年多时间里就印了十万册。记得当年我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梯形课堂里,以《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身份讲演我的新著时,听讲的大学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像要从他们头顶上爬到讲台上去似的。开讲以前,课堂上的气温已经让我满头大汗了。那是令人难忘的三小时……后来,在读者的要求下,我写了以下这篇关于《儒家文化困境》一书的写作感想。其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对近代屈辱的愤怒感,对旧传统的保守主义导致中国近代失败的责任追究意识,以及睡梦中常常会惊坐而起的激情……我和听众们都沉浸在反传统主义的激情之中。对于后现代主义与世俗化中的青年人,他们也许很难理解我们那一代人了。

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

几年以前,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学的专业是元代历史。头脑中尽是“硕德八剌”、“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孙帖木儿”之类的别扭古怪的蒙古皇帝的名字。那时,我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女作是一本研究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著作。虽然,我从小酷爱历史,但却很少涉猎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对这一段苦难的历史记录,始终抱有一种潜意识的厌恶感。记得那是在初中上近代史课的时候,老师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洋鬼子火烧圆明园、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情景,我当时曾满怀愤恨地想:假如那时我们中国人有重机枪多好!也许,正是不愿太多地经受那种情绪的刺激,我很少去读中国近代史的书(尽管这类书籍很多)。这方面知识的贫乏,对于一个历史系研究生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现在想来,无论是初中时期那种用机关枪向洋鬼子扫射的一闪而过的幻想,还是潜意识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厌恶,大概都可以算是一些不自觉的心理自卫手段。直到后来,我

在写作《困境》一书时,接触到一些有关深层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发现这种愤无所泄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活动,与近代中国人的种种心理表现,居然还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促使我踏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念头,是在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是1984年6月,当时,我正给大学生讲授清前期史那一段。在讲课时,我头脑中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年所揭示的清代士大夫在专制高压下的思想消沉和麻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应付近代西方挑战的反应能力?中国近代连续不断的挫折、失败和屈辱,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僵滞文化的反应迟钝有关?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以往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专著的基本主题,大体而言,是“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几乎很少有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应付外部刺激的能力上展开分析。而这一分析角度,对于正面临新的外部冲击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会提供更丰富的启示。那种过于简化了的“侵略—反侵略”的分析构架,似乎很难涵盖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化冲突的复杂的内容和同一历史现象的多义性。甚至还使人们削足适履地把中国近代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当作爱国主义来赞颂(这种学术倾向实际上我们屡见不鲜)。实际上,也会无意中助长现实生活中的闭关锁国的价值观。

一旦上述研究设想油然而生,就激起我跃跃欲试的探索愿望。我甚至放弃了已经开始动笔的元代政治史的写作计划,进入了这个过去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从1984年暑假开始,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阅读近代史料。

不久,我偶尔查阅到一部对我以后写作《困境》有重要影响的史料。那是迄今为止很少为人们引证的《柔远新书》。该书是光绪初年由一批正统派士大夫编纂的,内容是论述如何应付西方列强侵略的问题。柔远者,怀柔安抚远夷之意也。书名本身已经透露出这些深受民族屈辱与挫折的士大夫们执著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信念。这些正统派人士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危机所抱的荒谬见解,使我大为震惊。这批包括乾嘉大师俞樾在内的知识界精英人物竟然断言,洋人在鸦片战争后入侵中国,是因为上天可怜这批不开化的蛮夷,故让他们发明船舶机械,使他们得以远渡重洋,前来中国熏沐礼乐教化。这些“泛教化论”者还乐观地预言,不出一百年,全球九万里,将是“一道同风、尽遵圣教”的世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必在我朝无疑”——这就是他们对时局发展的基本估计。

在此以前，我绝没有料到，这批被人尊崇为“士林华选”的儒家学者们，居然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抱有如此颠倒的认识。这自然进一步引起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产生这种荒诞见解的认识心理机制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殖民主义入侵的种种信息，在这批士大夫的大脑思维中，经由什么样的处理，竟会导致这样一种荒诞错乱的判断？

随着史料阅读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我每天几乎总可以发现过去不曾意料到的新问题。例如，为什么连戈登这样的人物也会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变革都很冷漠”。在他看来，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又比方说，同时代的日本，把自己最优秀的青年送到欧洲去学习，这些青年返回祖国以后，几乎都成了推行明治维新的先驱人物。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只是在英国公使再三建议敦请之下，才勉强派出一个庸碌无能的退休知府，作为官方代表前往英伦考察。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于讨厌蒸汽机的轰鸣，竟半途中止了前往美国的旅行，返回中国。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个庸人几乎没有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自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六十年里，中国并不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为什么连已经得到的机会都被当时的士大夫官绅们莫名其妙地放弃？我还从《郭嵩焘日记》中得知这样一件事：当外国人对中国所派出的外交人员素质之低劣迷惑不解时，中国总理衙门的负责官员对此的回答竟是“老马识途”，以至于外国人反唇相讥：“这些人根本不是识途老马！”

我们出版了那么多近代史的著作和教材，这些论著对我们理解那个动荡的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们似乎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历史事实，而这类事实，对于面对新的西方挑战的当代中国人，无疑又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新的观察角度的重要性。

随着阅读的史料增多，卡片记录不断增加，于是，在我脑海中展现出中西文化近代冲突的一幅幅画面。其中有尚处于浑浑噩噩的士大夫中的少数先觉者的孤独和不祥的预感；国粹派外交官冥顽的自信和乐观；清流党人的大言高论和涕唾交颐的焦灼心态；洋务派官僚似乎总是那样欲言又止，左顾右盼；当然，还有庚子事变中饱尝屈辱冤抑的民众对于天兵神将下凡的憧憬和幻觉……

从阅读史料过程中获得的种种信息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感觉、直觉和片断的论点，一开始自然是无系统的，彼此无关联的，如散点一样，分布在大脑记忆的库存中。渐渐地，这些“游兵散勇”经由一些边缘学科方法的组织处理，终于部分地

有机结合起来。例如,第二章的内容是分析正统士大夫的群体认识心理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日本比较思想史学者中村元有关思维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的概念,以及语义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我考察中国士大夫对西学的认识心理障碍,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研究过程中,我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一直无法成功地解释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即对于大多数的正统士大夫来说,由于他们受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定式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固然一开始即抱着一种偏执傲慢的排外主义态度,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冷峻现实中屡遭屈辱和碰壁之后,没有改弦更张,相反,挫折和屈辱在正统士大夫中却不断激发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排外心理?换言之,为什么一种由认识心理机制支配的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在碰壁之后,反而畸变为一种非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定式?我发现,日本的开港国策,以及不失时机的仿效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结果产生一种不断趋向更为开放的社会心态的良性循环,而中国在应付西方挑战的历程中,正统士大夫们走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心理历程,即文化上的保守心态导致的应付西方挑战的失败,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保守心理,如此恶性循环,直至达到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畸形的反抗形式。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难题,几乎成了能否写出《困境》这本书的关键所在。它也是近代儒家文化的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的关键所在。在整整好几个月里,我尝试用各种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例如,我曾试图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往往经过复杂的、多环节的、复合三段论的推论,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才发现,这种纯粹的逻辑推论只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循环论证。即原先想论证的结论,不知不觉变成了论证的出发点。我几乎绞尽脑汁,不得其解。

由于一个偶尔的机会,我从书店里购来一本新出版的《心理学辞典》,由于我养成利用新鲜的边缘学科新概念术语来进行侧向思维的习惯,便信手阅读起来。在该词典中,“心理自卫机制”这一术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术语告诉我们,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的屈辱和挫折感无法经由正常的合理的方式疏导宣泄时,为了摆脱这种焦躁心理对人的精神身体的不良刺激,往往会不自觉地导致心理挫折的客观现实,重新加以主观的、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改变,以减轻精神上的苦痛,以此来维系心理上的平衡。这一心理学概念给予我巨大的启示,使我获得理解正统士大夫在经受失败屈辱刺激之后,由于缺乏合理疏导而向情绪化的排外主义